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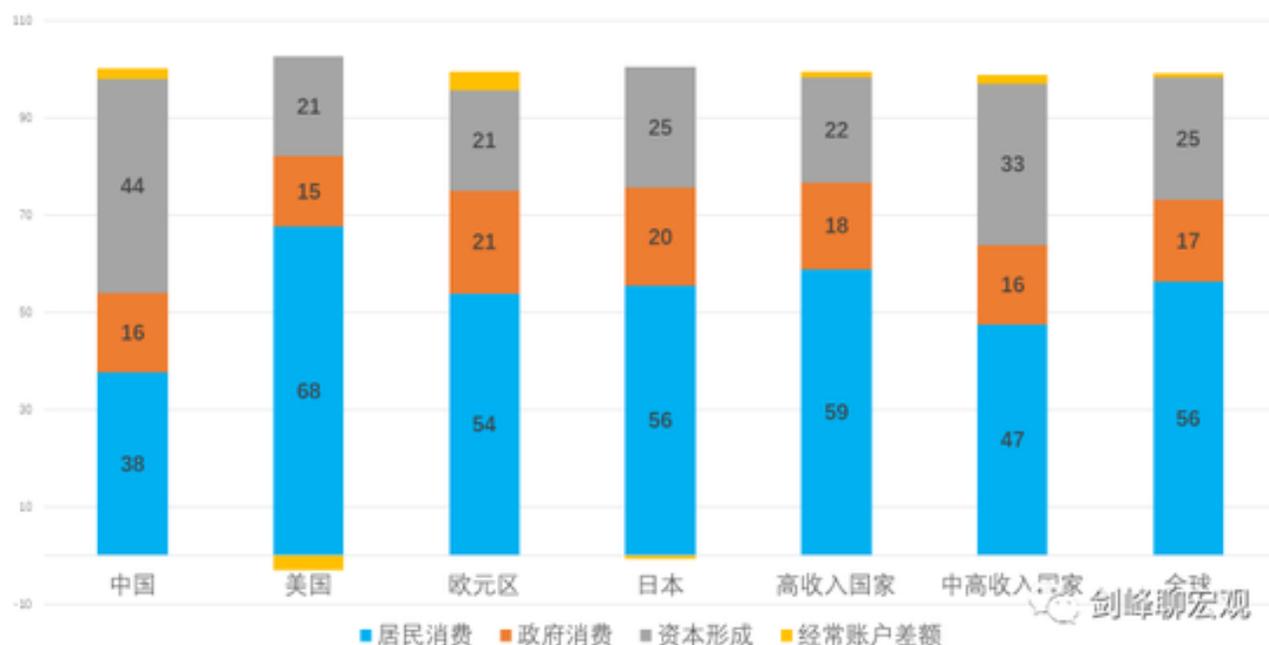
# 殷剑峰：为什么中国人 不消费？



文/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殷剑峰

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消费，投资只是手段。投资减少了今天的消费，是为了增加明日的消费。消费不仅是目的，而且，消费也决定了投资是否有回报。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投资越来越多，消费越来越少，那么，投资的回报率也会越来越低。最终，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也将难以为继。

2012-2021年主要国家GDP的需求结构 (%)



然而，观察 2012 至 2021 年间主要国家的 GDP 需求结构，中国居民消费率（居民消费/GDP）只有可怜的 38%，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，投资率（资本形成/GDP）则高了 19 个百分点。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，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 9 个百分点，投资率则高了 11 个百分点。与高收入国家、尤其是美国相比，消费低、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。

### 1、决定居民消费率的两大因素

对 GDP 需求结构的跨国比较似乎表明，中国人就是巴尔扎克笔下吝啬的葛朗台，贪恋财富，却节衣缩食、锱铢必较。真的是中国人过于“吝啬”吗？我们可以将居民消费率进行一个分解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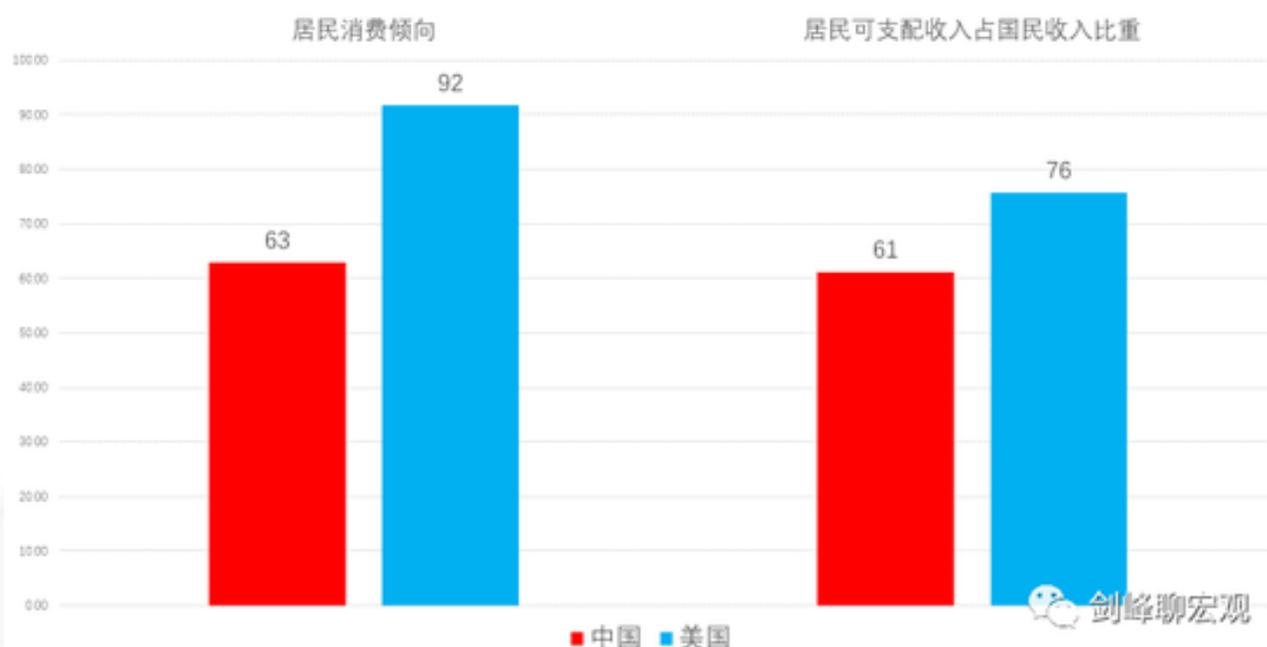
$$\text{居民消费率} = \text{居民消费} / \text{GDP}$$

$$= (\text{居民消费} / \text{居民可支配收入}) \diamond (\text{居民可支配收入} / \text{GDP})$$

$$= \text{居民消费倾向} \diamond \text{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}$$

所以，居民消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：其一，消费倾向，这等于每一元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；其二，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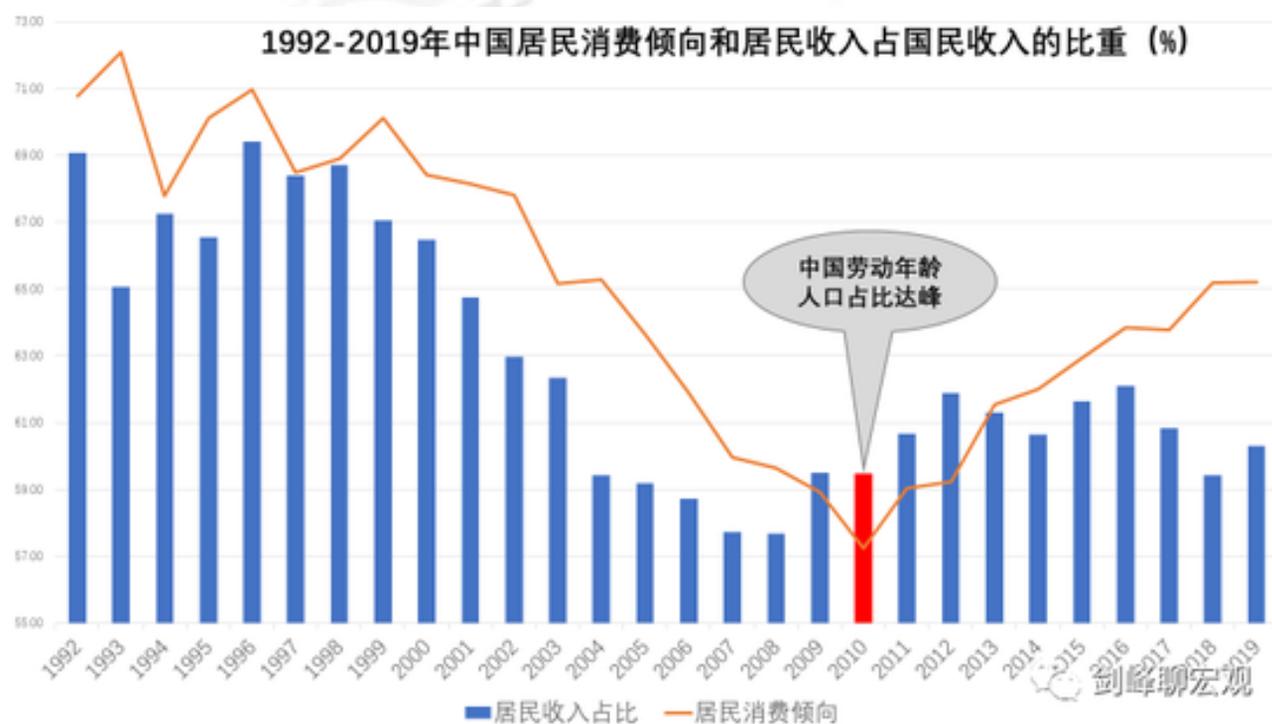
2001-2020年中美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(%)



在主要国家中，中美两国的总需求结构正好相反，中国是投资高、消

费低，美国是消费高、投资低。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倾向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。在 2001 到 2020 的二十年间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 61%，而美国是 76%；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 63%，而美国是 92%。

简单推算即可知道，在消费倾向既定的情况下，只要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到美国的水平，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 48%，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当；或者，在居民收入占比既定的情况下，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提高到美国的水平，居民消费率就将达到 56%，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。



那么，在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和消费倾向过低两个因素中，哪一个对消费的影响更大呢？是前者。因为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，收入高，收入稳定，消费倾向自然也就高。而且，观察新冠疫情前的数据可以发现，自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，居民消费倾向就在不断上升，相应的，

居民储蓄倾向（储蓄/可支配收入）不断下降。

人达峰之后消费倾向的上升和储蓄倾向的下降符合生命周期理论：在人达峰前的人口红利阶段，获得收入、进而储蓄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多，因而居民部门总体的消费倾向下降、储蓄倾向上升；在人达峰之后，退休的老年人口开始消费此前的储蓄，这必然导致消费倾向上升、储蓄倾向下降。然而，从人达峰之后的 2012 年算起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基本没有变化，2019 年的数据甚至还低于 2012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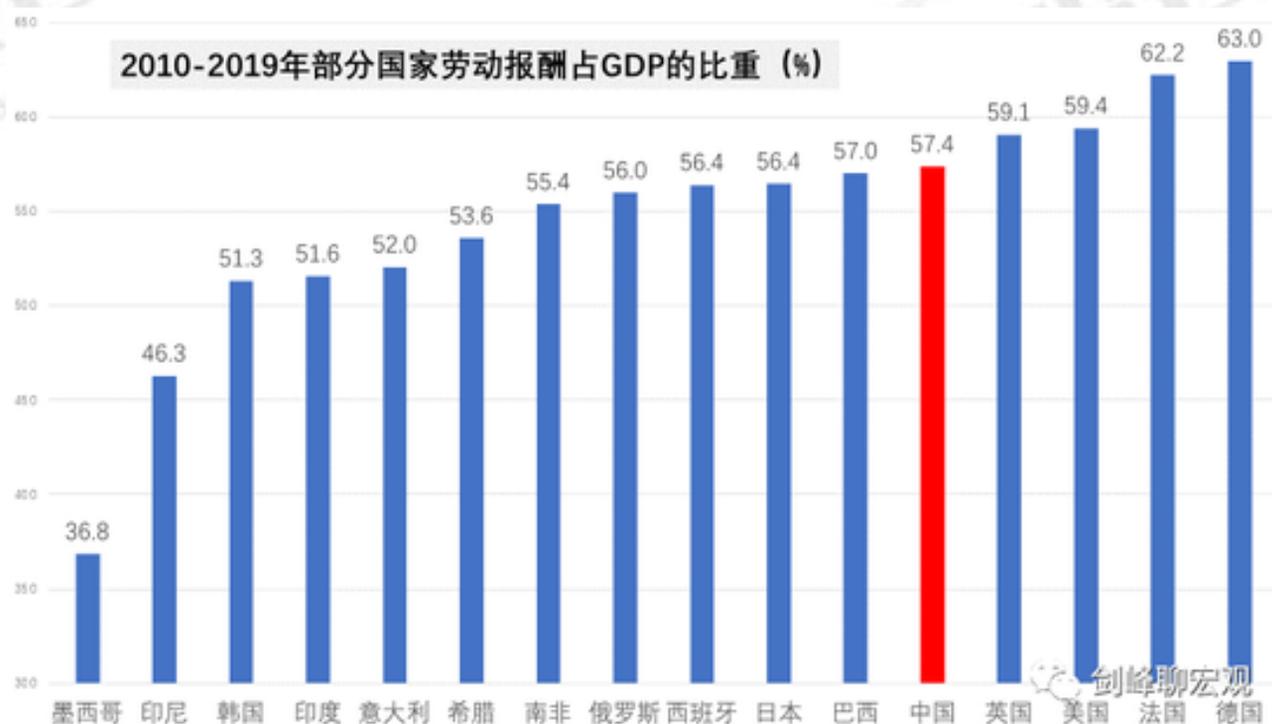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居民不消费不是因为“吝啬”，实在是囊中羞涩，“没钱”啊。可是，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位居主要经济体首位，人均 GDP 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，那么，“钱”去哪儿了呢？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的问题。

## 2、三种收入分配

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。一些人以为，与做大蛋糕相比，分蛋糕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实际上，分蛋糕也挺复杂。这里有三种分法：第一，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、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；第二，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；第三，国民收入在居民、企业、政府等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。三种分法中，最难的是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。

就第一种分配而言，在《资本论》中，通篇描述的都是资本与劳动之

间的分配关系。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，收入过低的工人阶级缺乏消费的能力，从而反过来又导致资本的过剩。一些人据此也以为，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原因就在于劳动报酬占比过低，因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成了自然的政策选项。然而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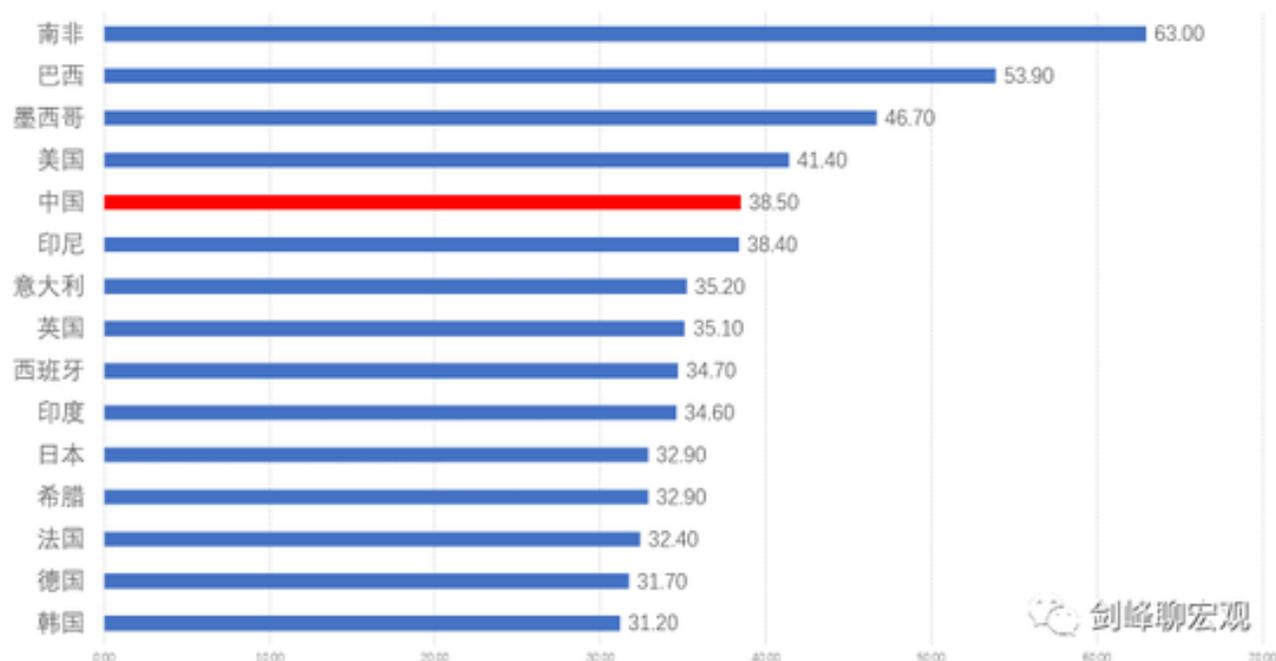


确实，在过去二十年中，随着资本对劳动力的取代，在许多国家中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。但是，横向比较看，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并不低。以2010至2019年部分国家数据为例，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%。这一数值虽然比英、美、法、德四国要低，但高于其余11个国家。在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，中国劳动报酬占比都是最高。所以，劳动报酬占比不是居民“没钱”的原因，而且，这也解释不了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。例如，巴西劳动报酬占比比中国略低，墨西哥劳动报酬占比则低至37%，但两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高达64%

左右。

与第一种收入分配直接相关的是第二种收入分配，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。资本剥削劳动的结果就是，在居民部门内部，形成了占有大部分收入和财富的少数富人和饥寒交迫的大多数穷人。富人，哪怕骄奢淫逸，也消费不完占有的财富；穷人，哪怕消费倾向再高，也无钱消费。于是，在每个人的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必然导致总体的消费能力下降。然而，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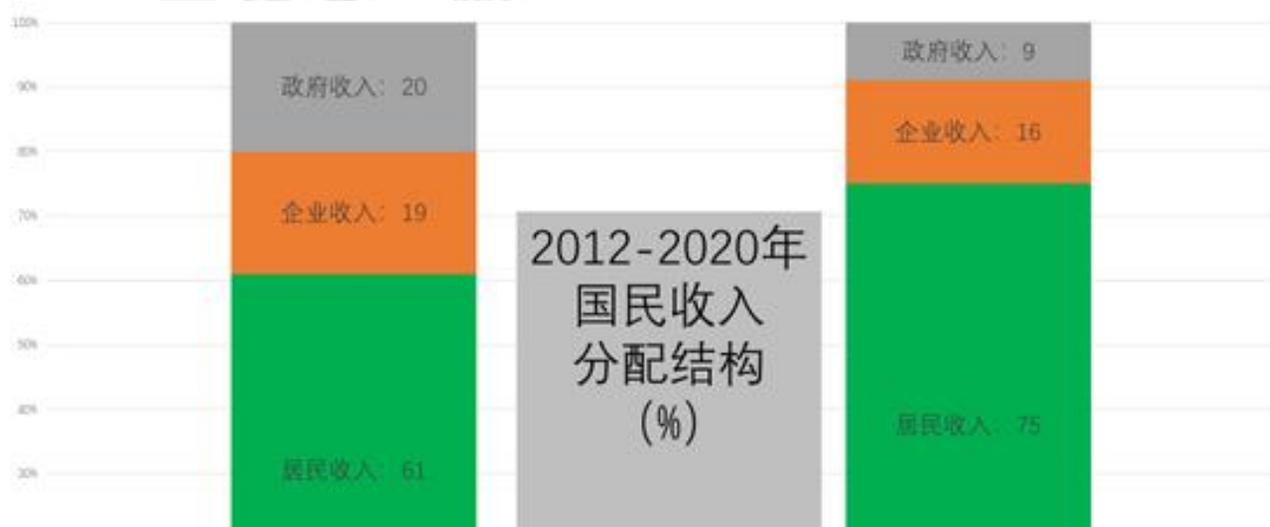
2018年部分国家基尼系数



基尼系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，该系数越高，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。比较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，在 15 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五。这表明，在这种意义的收入分配问题上，中国确实有改善的空间。但是，无论是基尼系数比中国低的国家，如英国、印度、日本等，还是基尼系数比中

国高的美国、墨西哥、巴西和南非，居民消费率都远高于中国的水平。而且，前面我们已经看到，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美国，其居民收入占比也高于中国。所以，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既解释不了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，也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无关。

第三种收入分配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在居民、企业、政府等三大部门之间的分配。[1]这种分配的结果一目了然：居民收入占比较低，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。比较 2012 至 2020 年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，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分别是 20%和 19%，而美国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9%和 16%。

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[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\\_51148](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51148)

